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116 期
2012 年 7 月 31 日

【苏联民族问题讨论专辑之九】

目 录

【论 文】

海外乌克兰人的民族主义活动及其影响 田 鹏

语言政策、民族主义思潮与前苏联的解体 田 鹏

【译 文】

《多民族国家：列宁与斯大林时期的帝国和民族构建》导言

Ronald Grigor Suny & Terry Martin 著，孙昉译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海外乌克兰人的民族主义活动及其影响

田 鹏¹

摘 要：一战及二战前后，移民至部分西方国家的乌克兰族人当中有相当数量的反苏联、宣扬乌克兰独立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在所在国家组织了乌克兰民族主义团体并开展活动，以期对所在国家、乌克兰及苏联施加影响，其中以美国乌克兰移民的活动最为活跃。本文重点分析了美国乌克兰族裔的民族主义活动，以及对美国社会、前苏联及乌克兰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民族认同往往使得境外民族主义的宣传及其它活动对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或其部分成员有可能产生很强的影响力，日益发展的互联网以及各类现代媒体则会强化其作用。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做好民族工作，是当代多民族国家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前苏联 乌克兰移民 民族主义

一、 引言

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同属东斯拉夫民族，语言、文化及宗教信仰都十分相似。历史上，乌克兰从未建成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其领土范围也从未确定。十月革命前，乌克兰东部长期处在沙皇俄国统治之下，其西部则为奥匈帝国的势力范围。十月革命后，乌克兰曾于 1918 年至 1921 年短暂独立，后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其西部边境在 1919-1920 年苏波战争后才确定，并由俄罗斯管辖。1945 年，西部各州并入乌克兰。1954 年，俄罗斯将克里米亚移交给乌克兰。至此，乌克兰的领土范围才基本确定。²

1922 年至 1991 年原苏联期间，作为最主要的加盟共和国之一，³ 乌克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十分强烈。在苏联社会政治动荡的 1991 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联合乌克兰、白俄罗斯共同宣布“苏联解体”。国内外有关原苏联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研究较多，这里不再一一概括。⁴ —

¹ 田鹏，博士，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丝绸之路欧洲研究联合中心，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人类学系访问学者（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9 月）。

² Paul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Greenwood Press, 2008, pp. xii-9

³ 根据 1926 年原苏联的人口统计，乌克兰人占总人口的 21%，仅次于苏联的 52%，两者合计占 73%。而位居第三位的白俄罗斯仅占总人口的 3%。见：E. Glyn Lewis, *Multilingu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Netherlands: Mouton & Co. N.C., Publishers, The Hague. 1972, p. 25—44.

⁴ 1.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般认为，乌克兰民族人口规模仅次于俄罗斯族，乌克兰人，特别是其精英阶层（这里主要指知识分子），对原苏联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十分不满，力图保持其语言、文化等民族认同，成为产生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的根源之一。

迄今为止，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研究都以乌克兰国内为研究对象，有关海外乌克兰移民民族主义的文章尚未见刊。本文拟对此进行专门研究。本文所指乌克兰移民，主要指移居到北美以及除原苏联之外的欧洲国家以及他们的后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美苏两大集团对峙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美国乌克兰移民数量相对较多，其民族主义活动也更为活跃，影响也更大，因为本文以美籍乌克兰人为主要考察对象，同时简要提及相关国家及地区乌克兰裔的民族主义活动。

二、美国乌克兰移民的基本背景

虽然从 19 世纪中期，乌克兰人就开始向美国移民，但“乌克兰移民”这一名称，是在 1930 年代之后才开始被美国媒体使用。在此之前，乌克兰移民被称为“小俄罗斯人”（little Russian）或者“鲁塞尼亚人”（Ruthenian）。¹ 可以看出，那时一般美国民众并不很清楚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的区别。

乌克兰人大量向美国移民，始于 1876 年以后。当时美国正从 1873—1876 年的经济萧条中恢复，企业亟需大量劳动力，但工会组织力量的不断壮大及罢工增多进一步加剧了缺工状况，于是专门招募外国劳工移民的代理机构应运而生。这些代理机构与轮船公司合作，在当时尚为奥匈帝国统治的乌克兰西部招募到大量乌克兰农民。到达美国之后，这些移民绝大部分受雇于矿山、铸造、纺织、伐木、建筑及铁路等行业。²

上述移民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一战爆发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由于美国收紧移民政策以及 30 年代大萧条的影响，移民至美国的乌克兰人数量急剧下降，大约为 15000 人，其中大部分为 1917-1920 年乌克兰自治政府³的支持者，包括官员、士兵、政府公务员以及知识分子。不过，相比之下，更多自治政府的支持者选择移民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⁴

像许多其它族裔的移民一样，美国的乌克兰移民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并保持了自己的生活方式。1885 年，乌克兰移民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了第一座自己的东正教教堂；1886，第一份面向乌克兰移民的报纸开始出版（起先为双月报，后改为周报）；1888 年，乌克兰移民成立了自己的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2. Roman Szporluk, *Russian,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00

3. Bilinsky, *The Second Soviet Republic*,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4.

¹ “Ruthenian” 是奥匈帝国及沙俄政府对乌克兰人的称呼。也有人将其翻译为“乌克兰”（乌克兰的英文为“Ukraine”）。

² Yaroslav J. Chyz, *The Ukraini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ted from The Almanac of the Ukrainian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for 1940 Scranton, Pennsylvania, 1939, pp. 1—6.

³ 1917 年 3 月 17 日，沙皇退位两天后，乌克兰进步社会党（Society of Ukrainian Progressives）的一些激进分子宣布成立乌克兰自治政府（Central Rada），苏维埃乌克兰一天前在基辅刚刚宣布成立。此外还有沙皇退位后刚刚成立的俄罗斯临时政府。因而有学者将其称为乌克兰历史上短暂的“三重政府”时代。乌克兰自治政府的口号是，要建立“在俄罗斯联邦下真正自治的乌克兰”，但俄罗斯临时政府拒绝承认其合法性。1917 年 11 月（旧历 10 月）十月革命爆发后，乌克兰自治政府的部队支持乌克兰苏维埃对临时政府的战斗。临时政府垮台后，乌克兰自治政府在 1917 年 11 月 20 日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自治共和国。与此同时，全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大会宣布成立，乌克兰陷入内战。处于劣势后，1918 年 1 月 25 日，乌克兰自治政府宣布独立，并于 1918 年 2 月 9 日与德国及奥地利签订和平条约，换取德国武力支持。1920 年 6 月，独立后的乌克兰自治政府被推翻。Paul Kubicek, *The History of Ukraine*, Greenwood Press, 2008, pp.79—90.

⁴ Orest Subtelny, *Ukrainians in North America---An Illustrated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102.

工会组织。十年之后，即 1896 年，在美国的东部及中部地区，已经形成了 94 个规模较大的乌克兰移民社区，107 个互助会（分别属于 2 个互助组织），42 座以乌克兰移民为主的东正教教堂。¹

乌克兰移民对其故土的关心，在所有的移民中十分突出，尤其是在一战及二战以后。早期的乌克兰移民，按其政治倾向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主张乌克兰的最终目标应是争取完全独立，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鼓励了这一主张；第二类认为乌克兰人只有与俄罗斯团结才可能抵御奥匈帝国，因而主张与俄罗斯联合。² 到 1935 年，美国的乌克兰移民人数，保守估计也在 70 万之上。而教堂已有 587 座，其中大部分人与教堂或者乌克兰民间互助机构，或者与两者均保持联系。早期移民的第二、第三后代，其职业范围也日趋多元化，³ 乌克兰移民当中强烈的族群意识以及比较完备的民间组织（包括教堂这一纽带），在日后乌克兰裔民族主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一波移民事件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结束后，在德国与奥地利，有大约 1600 万外国劳工、战俘以及难民，其中 220 万为乌克兰人，绝大部分是被德国人胁迫来从事苦力的年轻人。二战结束后，绝大部分从事苦力劳动的年轻人都返回了乌克兰。大约 220,000 名乌克兰人，以及 250 万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人拒绝返回。这些人滞留在由美英法占领下的德国部分，成为难民。大约 20% 乌克兰难民是政治难民，大部分是来自乌克兰西部的知识分子。据统计，其中大约有 1000 名教师，400 名工程师，350 名律师，300 名医生，300 名牧师，200 名学者，以及 2000 多名大学生。在等待最终安置国家的四年多时间里，这些生活在难民营的乌克兰人建立了多种政治、文化乃至自治组织，并办起了两所大学程度的学院（分别是乌克兰自由大学以及乌克兰技术与经济学院⁴）以及相当数量的中小学。⁵

1951 年，上述乌克兰难民被安置完毕：其中美国 80,000 人，加拿大 30,000 人，澳大利亚 20,000 人，英国 20,000 人，比利时 10,000 人，法国 10,000 人，巴西 7000 人，阿根廷 6000 人。而许多前往欧洲及拉丁美洲的乌克兰人最终也去了美国及加拿大。⁶

可以看出，一战及二战之后前往美国的乌克兰移民，相当部分是主张乌克兰独立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他们受教育程度最高并且组织能力很强，这部分移民成为日后乌克兰民族主义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一战及二战之后，除美国外，加拿大及欧洲也有不少乌克兰移民。

三、乌克兰移民的民族主义活动及其影响

美国是乌克兰移民民族主义活动最为活跃的国家。美籍乌克兰人各种民间互助团体很多，绝大部分为互助性质的行业协会或者地区协会。第一个全国性的乌克兰移民组织“全美乌克兰人协会”（缩写为 UNA，即 The Ukrainian National Association，后扩展到北美）成立于 1894 年，以帮助乌克兰移民适应新环境为其宗旨，一战尤其是二战后也积极参与了反对苏联、支持乌克兰独立的民族主义活动。以反对苏联、宣扬乌克兰独立为宗旨的第一个全国性乌克兰移民组织“全美乌克兰组织联盟”（缩写为 UUOA，即 The United Ukrainian Organizations of America）成立于 1922 年，其成员包括 176 个各类乌克兰移民组织。UUOA 组织了一系列全美范围针对前苏联的示威游行，以引起美国民众以及政府、特别是美国议会对外国对乌克兰的关注。例如，1932—1933 年，乌克兰爆发大饥荒。1933 年 11 月，UUOA 以“挽救因饥荒而死亡的乌克兰”为主题，组织美籍乌克兰

¹ Yaroslav J. Chyz, *The Ukraini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ted from The Almanac of the Ukrainian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for 1940 Scranton, Pennsylvania, 1939, p.7.

² Yaroslav J. Chyz, *The Ukraini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ted from The Almanac of the Ukrainian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for 1940 Scranton, Pennsylvania, 1939, p.8.

³ Yaroslav J. Chyz, *The Ukraini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ted from The Almanac of the Ukrainian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for 1940 Scranton, Pennsylvania, 1939, pp.30-31.

⁴ 英文名称分别为 Ukrainian Free University 以及 The Ukrain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前者于两战期间在布拉格创建，后迁移至慕尼黑。

⁵ Orest Subtelny, *Ukrainians in North America---An Illustrated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p. 191-194.

⁶ Orest Subtelny, *Ukrainians in North America---An Illustrated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195.

兰人在美国各大城市举行反对苏联大游行。据当时“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报道,乌克兰裔游行队伍在波士顿、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大城市与亲苏联的反游行队伍发生激烈冲突,导致数百人受伤。次年5月28日,在UUOA的游说下,美国众议院通过了339号决议,呼吁苏联政府“不要设置障碍,以便美国公民向遭受饥荒的乌克兰地区提供金钱、食品以及其它生活必需品等援助”。¹

二战爆发后,一些乌克兰移民认为乌克兰将迎来独立的机会,便于1940年5月在原“全美乌克兰组织联盟”(UUOA)的基础上成立了“美国乌克兰人大委员会”(缩写为UCCA,即the 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以反对苏联、宣扬乌克兰独立为宗旨。从此,UCCA成为组织协调美籍乌克兰人民民族主义活动的主要机构。²该机构一建立,就创办了刊物《乌克兰季刊》(The Ukrainian Quarterly),并将这一刊物称为乌克兰与苏联斗争的媒体,是遭奴役的东欧人民(主要指乌克兰人)的喉舌。该杂志每期第一篇文章均为编辑部社论,评论时事。其它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抨击苏联,以各类负面分析文章为主,将苏联描述为传统意义上的帝国,是自由世界的最大敌人;第二类论述乌克兰民族独立的正当性,以乌克兰民族历史及文化为主,突出乌克兰民族与俄罗斯民族是不同的两个民族,而且历史上乌克兰民族屡屡遭受俄罗斯族的压迫;第三类分析苏联权力中心俄罗斯与其它加盟共和国的法律关系,试图说明各加盟共和国受制于莫斯科,并将乌克兰定位为欧洲最大的被奴役民族。³

除了刊登上述文章外,该期刊还多次刊登批评美国对苏联政策不够强硬的文章。1952,该刊编辑部社论批评美国对苏联政策采取实用主义。⁴1953年秋季,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美国召开会议,“美国乌克兰人大委员会”派人参加,结果遭到苏联政府抵制,美国政府做出让步。本次会议因而成为“美国乌克兰人大委员会”最后一次派代表参加此类会议。该期刊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在此事上向苏联(在1953年之前抵制科教文组织)让步是没有守住道德底线。⁵1958,美国国务院调整了“美国之音”对苏联的播放时间及播放语言:1、取消了从德国慕尼黑向中亚每天上午15分钟的乌兹别克语广播;2、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爱沙尼亚语以及乌克兰语言广播每天压缩一小时;3、增加对苏联的英语广播,每天增加半小时的俄语广播。对于上述调整,该杂志以“还是美国之音吗?”为题发表文章表示抗议,并反驳了美国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辩称乌克兰等语言为少数民族语言的观点,认为这一调整违背了“美国之音”反共产主义宣传的目的。⁶1959年,赫鲁晓夫应邀访美,该杂志刊文批评美国政府向苏联示好。⁷

1990年,原苏联民族矛盾尖锐,政治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该刊报道了乌克兰政府在当年7月16日声明乌克兰拥有主权,但未明确表示从苏联退出,并评论这或许是乌克兰当局想通过有主权的加盟共和国来挽救苏联。⁸1991年,该刊报道了当年8月24日乌克兰议会就是否独立的投票结果:近400名代表,321同意,2反对,6投弃权,31人未投票,绝大部分前共产党人都投了赞成票。⁹乌克兰独立后,该期刊由《乌克兰季刊—东欧及亚洲问题研究》改为《乌

¹ Myron B. Kuropas, *Fighting Moscow From A Far*, in Ieva Zake(ed) *Anti-communist Minorities in the US*,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50-51.

² Editorial: 50 Anniversary of the 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Spring 1991, Vol. XLVII, no. 1, pp.5-9.

³ Lev E. Dobriansky, In the Mainstream of basic Issues,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Cumulative Index 1944-1966*, pp. 19—26.

⁴ Lev E. Dobriansky, America's Developing Realism Toward Russia,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winter 1952, Vol. VIII, no.1, pp.13-17.

⁵ Editorial: The Forfeited Battleground,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Spring 1961, Vol.XVII, no.1,pp.5-8.

⁶ Editorial: The voice of America?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Sep. 1958, Vol.XIV, no.3, pp. 198-203.

⁷ Editorial: The Khrushchev Visit,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Sep. 1959, Vol.XV, no. 3,pp. 197--205.

⁸ Editorial: Sovereignty, The Soviet-Russian style, and new Soviet Union Agreement, *Ukrainian Quarterly*, Winter 1990 Vol. XLVI, no 4, p.357.

⁹ Editorial: August 24, The Proclamation of Ukraine's Independence,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Winter1991 Vol. XLVII,

克兰季刊—乌克兰及国际问题研究》。其宗旨也从宣扬乌克兰独立改为乌克兰研究。目前，该刊与《哈佛乌克兰研究》(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¹成为以英语发行的国际上两种主要乌克兰学术期刊。²

“美国乌克兰人大委员会”将其在美国的各项民族主义活动，包括发行刊物的目的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向美国及欧洲民众表明乌克兰民族独立的合法性，要使美国及欧洲民众明白，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并不一个民族，宣传乌克兰文化以及乌克兰人民的历史；二是向乌克兰人民传递自由的声音。³从有关材料看，这两个目的，尤其是第一个目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接触美国政客，主要包括美国国会议员、美国总统等，获得了美国政府官方的公开支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49年11月“美国乌克兰人大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美大会，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致信祝贺：“……感谢你们对美国做出的贡献，并对你们关注并致力帮助乌克兰人民表示敬意，他们无法享有我们在这里所享有的自由。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你们在乌克兰的亲人了解美国的民主，收听自由电台，读到未经审查的报纸……”。⁴

1960年“美国乌克兰人大委员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信致辞：“……乌克兰裔美国人对美国的爱国主义、创新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自由世界的人们要帮助世界各地争取自由的人民。”⁵

时任美国参议院议员的肯尼迪也致信大会：

“很高兴利用这一机会(通过乌克兰美国人大委员会主席 Lev E. Dobriansky)祝贺美国乌克兰人大委员会20周年纪念大会的召开。美籍乌克兰人有特殊的原因珍惜自由。而且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在苏联，有四千五百万乌克兰人以及其它许多非俄罗斯民族正在为获得自由与民主而战。

……今年夏天，我很高兴与你们的执行主席 Stephen J. Jarema 见面。我对他说，目前美国共和党政府使用的“苏联民族”一词令人感到非常遗憾。这一用语完全违背了去年通过的“被

XLVII, no.4, pp.357-359.

¹ 1977年创刊，主办单位为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1973年成立)。

² 分别以两种期刊的英文名称在谷歌查询：“Ukrainian Quarterly”有1,280,000个结果，“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有5,510,000个结果；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图书馆国际学术期刊全文搜索“Ukrainian Quarterly”，有35次引用，“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有91次引用。2012年5月30日查询。

³ Clarence A. Manning, Twenty years of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Cumulative Index 1944-1966*, pp. 27—35.

⁴ Editorial: A quarter of Century: Jubilee Of 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winter 1965, Vol.XXI, no. 4, p.296.

⁵ Editorial: A quarter of Century: Jubilee Of 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 *The Ukrainian*

“被奴役民族周”决议的精神，暗示我们接受了共产主义铁幕中受奴役民族的命运。我特此声明，我们将坚守我们在民主论坛中达成的原则：‘我们将不会放弃我们对维护自由的承诺，也绝不放弃处在共产主义铁幕之中那些人民’”。¹

1962年10月12—14日“美国乌克兰人大委员会”召开第八次大会，已担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致信祝贺：“……如果我们的美裔乌克兰人不能保持他们对从前的祖国以及乌克兰人命运的关注，这将是令人吃惊、而且违背美国传统的一件事……美国政府以及人民将坚决支持所有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这将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²

2、通过游说美国政府，主要是议会，促成美国议会通过了所谓“被奴役民族周”议案。该议案称：“由于自1918年以来俄罗斯共产主义的帝国主义及侵略政策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对美国及自由世界的安全构成威胁”以及“共产主义苏联通过直接或者间接侵略征服了波兰、匈牙利、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爱沙尼亚等”的事实³，议会“授权美国总统指定1959年7月第三个星期为‘被奴役民族周’，请美国人民以合适的仪式及活动予以纪念。议会授权并要求美国总统此后每年发布声明，直到所有受奴役的民族得到自由。”将“被奴役民族周”设在美国独立日所在的7月，也显示了美国议会的特别用意。⁴不过，这一法案招致苏联的强烈批评，苏共《真理报》(Pravda)发表文章，称该决议是“美帝国主义粗俗、肮脏的攻击”。⁵

为避免刺激苏联，美国总统每年发表的声明往往比较低调，并不提及苏联或者相关民族的名称，也没有“独立”、“解放”之类的字眼，只是泛泛而谈。例如1962年，美国全国连续第四年举行此类活动，美国总统肯尼迪在7月13日向全国发表的声明中提到：

“……鉴于美国议会的授权及要求；

鉴于受奴役民族与美国人民之间有很多历史与文化的联系纽带；

Quarterly, Winter 1965, Vol. XXI, no. 4, p.296.

¹ Editorial: A quarter of Century: Jubilee Of 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Winter 1965, Vol. XXI, no. 4, p.297.

² Editorial: A quarter of Century: Jubilee Of 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winter 1965, vol XXI, no. 4 p.296.

³ 事实上，美国议会在该法案中将乌克兰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并列，并不能代表当时美国政府的主流观点。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 1904/2/16 - 2005/3/17), 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他提出的遏制政策(policy of containment)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并曾于1952年杜鲁门担任美国总统时出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在此之前作为美国外交官在苏联工作多年，是当时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1963年，该法案通过后第4年，在谈到苏联加盟共和国未来可能的独立时，他认为“……波罗的海国家提出这一要求有其合理性。但另外一些例子则属于虚构，而且有些荒唐。‘被奴役民族决议’将一些民族群体作为渴望独立的民族罗列出来，但历史上这些民族从未有过任何实质意义上的独立。美国国会通过这样的决议并要求国家制定政策时考虑到这些民族的解放，这真是不可理解……有人说，乌克兰人渴望从传统的俄罗斯国家中完全独立出来，或许吧。但谁知道真实情况呢？在过去的45年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在这一问题上了解乌克兰人的真实意愿。乌克兰从未真正独立过。历史也从未显示大部分乌克兰人希望完全脱离俄罗斯。有些人些告诉我们，就是如此——乌克兰人希望独立。这些人很有可能已经很多年没有与乌克兰中部的人有过接触了。”George Frost Kennan, *On Dealing with the Communist World*, Published 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3, pp.12—13.

⁴ Lev E. Dobriansky, The Captive Nations Week Resolution, *the Ukrainian Quarter*, Sep. 1959, Vol. XV, no. 3, p.207.

⁵ Lev E. Dobriansky, The Captive Nations Week Resolution, *the Ukrainian Quarter*, Sep. 1959, vol. xv, no. 3, Sep. 1959,

鉴于民族自治原则、自由以及人类的共同遗产；

我，肯尼迪，作为美国总统，要求美国人民以适当的方式及活动表示纪念，继续给所有

民族独立及人类解放的事业给予支持。”¹

3、1964年6月2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树立了乌克兰历史与文化名人塔拉斯·舍甫琴科的雕像²，超过10万乌克兰裔出席现场仪式，其中绝大多数为美籍乌克兰人，另有少量加拿大籍乌克兰人。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为雕像揭幕。³

对于美籍乌克兰人民族主义活动对乌克兰国内的影响，由于缺乏相关资料，只能间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从“美国乌克兰人大会委员会”参与的针对苏联特别是前乌克兰的相关宣传；二是从原苏联，包括乌克兰方面的相关反应。冷战期间，“美国乌克兰人大会委员会”主办的《乌克兰季刊》，发行仅限于北美及部分欧洲国家，在乌克兰属于非法期刊，只有个别流入。但“美国乌克兰人大会委员会”积极参与了美国之音的乌克兰语广播以及“民主欧洲电台”⁴的乌克兰语广播，⁵其宣传效果应该会得到加强。

从前苏联以及乌克兰政府对美籍乌克兰人民族主义活动的反击上，可侧面了解其对前苏联及乌克兰国内的影响：1960年12月29日的《乌克兰苏维埃报》(Radyanska Ukrainian)发表文章，批评《乌克兰季刊》的某些文章的作者“为了喝外国的一份汤而出卖祖国”。1961年5月，《乌克兰共产党人报》(Kommunist Ukrainy)发表文章，抨击一些有关乌克兰历史的文章蓄意捏造，旨在煽动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仇视。⁶此外，前苏联及乌克兰政府曾多次抨击美国议会通过的“被奴役民族周”。1962年美国举行“被奴役民族周”期间，苏联《消息报》(Izvestia)于7月17日发表文章，强烈抨击了美国的这一做法。⁷由此可见，美籍乌克兰人的民族主义活动在苏联及乌克兰境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否则当时苏联，包括乌克兰相关部门不会予以反击。

这里对美国之外其它以反对苏联、宣扬乌克兰独立为宗旨、影响较大的海外乌克兰人组织作一简单介绍。1946年1月，英国乌克兰移民成立了“英籍乌克兰人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Ukrainian in Great Britain)，组织英国乌克兰移民的各类民族主义活动。1954年12月该协会创办季刊《乌克兰评论》(The Ukrainian Review)，其宗旨与《乌克兰季刊》基本一致，⁸但其影响远小于《乌克兰季刊》。1940年，加拿大籍乌克兰人成立了“加拿大乌克兰人协会”(缩写为UCC，即Ukrainian Canadian Committee)，但其活动远不如“美国乌克兰大会委员会”活跃。⁹1967年11月，“世界自由乌克兰人大会”(缩写为WCFU，即World Congress of Free Ukrainians)在美国纽约成立，来自17个国家的1300余名海外乌克兰人代表举行了长达一周的会议并在纽约著名的麦迪逊广场花园组织了超过1万人集会活动。¹⁰“世界自由乌克兰人大会”后更名为“世界乌克兰

vol.xv, no. 3 p.208.

¹ 对美国总统声明没有明确提及“被奴役”民族的名称，该杂志表示不满。见：Editorial: the President and the “Captive Week Proclamation”,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summer 1962, vol. xviii, no.2 p 102.

² 英文名为 Taras Shevchenko，乌克兰伟大的诗人、作家、剧作家、艺术家、政治和社会活动家。

³ Orest Subtelny, *Ukrainians in North America: An Illustrated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p. 236—237.

⁴ 即“Radio Liberty”，该电台由美国议会资助，冷战期间，其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

⁵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and Enslaved Ukraine (An Interview),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Cumulative Index 1944-1966*, pp31-35

⁶ Walter Dushnyck, “Two Decades in its role of Enlightenment”,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Cumulative Index 1944-1966 pp. 7-17

⁷ Editorial: the President and the “Captive Week Proclamation”,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summer 1962, vol. xviii, no.2, pp. 101 –108.

⁸ editorial, *The Ukrainian Review* Vol. 1, no.1, 1954 p3

⁹ Orest Subtelny, *Ukrainians in North America---An Illustrated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186

¹⁰ Myron B. Kuropas, *Fighting Moscow From A Far*, in Ieva Zake(ed) *Anti-communist Minorities in the US*, Palgrave

兰人大会”（缩写为 UWC，即 Ukrainian World Congress），该组织今天依然存在，并声称其成员包括 32 个国家的乌克兰裔民间组织，代表了 2 千万海外乌克兰裔。¹ 在这些主要的海外乌克兰人组织中，“美国乌克兰人大会委员会”（UCCA）最为活跃。1965 年，在其成立 25 周年纪念大会时，UCCA 自称其会员包括了 2 百万美籍乌克兰人。² UCCA 至今仍然在美国开展活动，其宗旨也从冷战期间反对苏联、宣扬乌克兰独立变为“支持美籍乌克兰人开展彰显乌克兰裔美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及人文活动，并对成长中的民主乌克兰提供帮助”。³

冷战期间，西方国家的一些俄罗斯裔成立了反对苏联共产党政权的民间组织并得到了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例如，美籍俄罗斯人成立了“俄罗斯各族人民解放委员会”（缩写为 ACLPR，即 American Committe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s of Russia），并在美国国会资助下创办了针对苏联的“民主欧洲电台”（Radio Liberty）。但这类俄罗斯裔组织虽然反对苏联共产党政权，但并不宣扬各加盟共和国应该独立的主张，因此与“美国乌克兰人大会委员会”（UCCA）虽然有一些合作，但一直存在矛盾。⁴

四、结束语

苏联成立后，尤其是冷战期间，西方国家乌克兰裔反对苏联、宣扬乌克兰独立的民族主义活动十分活跃，尤其是在美国。有学者认为，冷战期间活跃在美国的反苏联、反共产主义族裔团体，包括来自前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以及乌克兰、立陶宛、亚美尼亚等族裔，美籍乌克兰人规模最大、组织最为有效，声势也最大。⁵ 可以认为，一战及二战以后来自乌克兰西部、主张乌克兰独立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冷战期间，美苏两尖锐对立，美国国内反共反苏联的政治环境及民间氛围客观上十分有利于诸如“美国乌克兰人大会委员会”（UCCA）这样的民族主义组织开展活动、扩大影响。而美国政府的支持也起了一定作用，例如多位美国总统及美国政要的公开致信⁶，议会通过相应法案等等。事实上，冷战之前，特别是 1930 年代，在北美及欧洲各国，乌克兰移民中也有一定数量的规模较小的左派组织，持亲苏联立场，亦不主张乌克兰独立。但在冷战对峙开始后，这些左派组织生存空间日趋狭小，最终陷于瘫痪，⁷

在导致前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中，各加盟共和国民族意识的增强以及民族问题的激化是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⁸ 海外乌克兰人，包括美籍乌克兰人的民族主义活动对乌克兰上述因素的影响或许非常有限。但是，民族认同往往使得境外民族主义的宣传及其它活动对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或其部分成员有可能产生很强的影响力，日益发展的互联网以及各类现代媒体则会强化其作用。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做好民族工作，是当代多民族国家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Macmillan, 2009, pp 58—59.

¹ http://www.ukrainianworldcongress.org/UWC_History_en_260cms.htm, 2012/5/30 查询。

² Editorial: A quarter of Century: Jubilee Of 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Winter 1965, Vol. XXI, no. 4, pp. 293-297.

³ <http://www.ucca.org/en/about-us/mission>, 2012 年 6 月 1 日查询。

⁴ Lev E. Dobriansky, *The Making of A Mission, the Ukrainian Quarter*, Autumn, 1952, Vol. XIII, no. 4, pp. 328—338.

⁵ Myron B. Kuropas, *Fighting Moscow From A Far*, in Ieva Zake(ed) *Anti-communist Minorities in the US*,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43.

⁶ 需要说明的是，与美国议会不同，美国总统及政府的支持并不代表支持乌克兰独立。参见注释 30：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的观点。

⁷ Orest Subtelny, *Ukrainians in North America---An Illustrated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pp. 130—139.

⁸ 参见：1. 潘广辉 吴婧，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欧、美学界的研究，载《世界民族》，2006 年第 1 期，第 1—15 页。2. 张骥 齐长安，苏联解体的文化原因分析，载《社会主义研究》，2003 年第 6 期，第 33—35 页。

【论 文】

语言政策、民族主义思潮与前苏联的解体

田 鹏¹

摘要：加盟共和国民族意识的增强及民族问题的激化是导致原苏联解体的两个重要因素。本文系统分析了前苏联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与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原苏联民族语言政策存在如下失误：一是语言政策与宪法原则及苏共的民族政策指导思想不一致，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使得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情绪具有正当性并对其有很大程度的强化作用；二是过分强调语言政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作用；三是双语政策仅针对非俄罗斯民族，不利于俄罗斯民族与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交流。这些失误强化了加盟共和国已存在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苏联解体的文化因素之一。

关键词：语言政策 民族主义 乌克兰 苏联

一、引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或“苏联”）是一个有着独特政治框架的联邦制国家。在沙俄时代，各民族地区处在沙俄政府的高压统治下。十月革命前后，一些民族地区纷纷独立，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而后与俄罗斯联合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盟宪法规定，各成员国地位平等，具有高度自治权，包括主权，且有退出联盟的权利，² 这有别于世界其它任何联邦制国家的组成原则。³ 不过，联盟宪法如此规定，并非当时苏联主要领导人列宁及斯大林倾向于如此，而是若不具有如此特征的联邦制建国，那些业已独立的苏维埃国家便不大可能与俄罗斯联合起来组建联盟。按照列宁的设想，这种联邦制只是权宜之计，最终应过渡到完全的统一。⁴ 然而，自苏联成立后直至解体，联盟宪法中关于各成员国具有主权且可自

¹ 田鹏，博士，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丝绸之路欧洲研究联合中心，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人类学系访问学者（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

² 苏联宪法（1977年版）第72条：“加盟共和国享有自由脱离联盟的权利”及第76条：“加盟共和国具有主权，并与其它苏维埃加盟共和国联合起来。” Boris Topornin, *The New Constitution of USSR*, Progress Publishers, 1987, pp. 284—287. 本文引用的外文文献，若无特别说明，均由本文作者译为中文。

³ 此处“有别于其它任何联邦制国家的组成原则”，不仅仅是指其成员有脱离联盟的权利。Richard Pipes 分析了1918年苏维埃俄罗斯宪法在起草过程中关于联邦制组成原则的讨论过程。在以经济、地理、族群或者历史区域等多种方案中，最终确定以民族地域自治为原则建立联邦制。Richard Pipe 认为，苏维埃俄罗斯是以民族原则作为联邦结构基础的第一个现代国家。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110—112.

⁴ 列宁认为：“联邦制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既然承认联邦制是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那就必须力求达到愈来愈紧密的联邦制同盟”。见：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见

由退出的条款一直没有改变。因此，在苏联社会政治动荡的 1991 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联合乌克兰、白俄罗斯共同宣布“苏联解体”并不违反苏联宪法。从理论上讲，由时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应该更为合适，但戈尔巴乔夫反对苏联解体，而俄罗斯、乌克兰及白俄罗斯同属斯拉夫文化，是原苏联最为核心的三个成员。这三个成员国退出联盟，苏联事实上就已经解体了。

原苏联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在战胜轴心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战结束后，苏联曾是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舞台因而发生巨变。国内外学术界虽然在分析苏联解体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一般认为下列因素是造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苏共中央民族政策的失误、加盟共和国民族自我意识增强、原苏联联邦制变形、民族经济利益冲突、人口迁移政策失误、俄罗斯联邦的离心倾向、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以及外部因素的推动与民族问题的激化等。¹ 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削弱了苏共的核心领导作用，使得苏联解体最终不可避免。²

民族问题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分析前苏联民族矛盾，多以政治、经济等为切入点，虽然也有涉及文化因素的研究，但系统、翔实联系前苏联民族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进行分析的研究尚未见到。本文拟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系统地探讨前苏联语言政策失误与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联系，并为我国民族研究提供借鉴。³

本文认为，原苏共中央在民族语言政策⁴存在如下失误：一是语言政策与宪法原则及苏共的民族政策指导思想不一致，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二是过分强调语言政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作用；三是双语政策仅针对非俄罗斯民族，不利于俄罗斯民族与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交流。这些失误强化了已存在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苏联解体的文化因素之一。本文拟系统归纳前苏联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分析其失误与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鉴于乌克兰与俄罗斯同属于斯拉夫文化，其人口规模仅次于俄罗斯，且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一起在 1991 年宣布前苏联解体。因此本文在讨论时，较多引用了乌克兰的相关材料。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分析第一个失误，对其余两个失误仅作简要概括。

二、原苏联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对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

1、苏联建国初期至 1930 年代中期的语言政策

在十月革命之前，长达三个世纪的扩张政策使得沙皇俄国的民族构成及语言使用十分复杂，有大约 180 种由不同民族使用的各种语言，⁵ 这些语言分别属于印欧、阿尔泰、乌拉尔以及伊比利亚高加索等多个语系。其中印欧语系的东斯拉夫语族包括了俄语，以及与俄语十分接近的乌克兰语以及白俄罗斯语。根据 1926 年苏联的人口统计，以这三种东斯拉夫语为母语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及白俄罗斯人分别占苏联总人口的 52%、21%、3%，在当时苏联人口中列前三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2012 年 4 月 23 日查询）：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200605.htm>

¹ 参见：1.潘广辉 吴婧，“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欧、美学界的研究”，《世界民族》2006 年第 1 期，第 1-15 页。

2. 张骥 齐长安，“苏联解体的文化原因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03 年第 6 期，第 33-35 页。

² 参见：朱秀芳，“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历史诠释——再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121-136 页。

³ 本文中，“民族情绪”指由于本民族合法权利未得到尊重而引发的对政府尤其是联盟政府的不满情绪；“民族主义”指要求维持本民族语言、文化及历史在其加盟共和国的主导地位；“民族主义思潮”指民族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突出表现；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指脱离联盟的舆论或行为。

⁴ 为避免重复，下文多以“语言政策”代替“民族语言政策”。

⁵ E. Glyn Lewis, *Multilingu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Netherlands: Mouton & Co. N.C., Publishers, The Hague. 1972, p. 17.

其人口之和占当时苏联人口的 77%。¹ 可以认为,这三者是前苏联的核心成员。

沙皇俄国时代的语言政策与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政策大体一致,即力图通过语言同化来构建文化共同体。19 世纪中叶,沙皇政府对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颁布了一系列禁止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法令,推行所谓“义务国语制”,大力推广俄语,压制少数民族语言。各少数民族只能学习、使用俄语,其它民族语言不得用于教学及出版文艺作品。² Michael G. Smith 认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法国、德国及意大利语言同化政策相对成功的经验,成为沙俄政府推广语言同化政策的动力。³

苏联成立后,宪法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是一个由具有主权、平等的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盟,这也成为苏联民族政策及语言政策的理论基石。列宁明确指出:“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⁴并要求在法律上“废除任何语言的特权,实现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经费。”⁵可见,列宁明确反对利用国家权力来推行某一特定语言,也不主张指定某一语言为国家语言。他认为,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发展自然会推动一种应用性最广、使用最为便利的语言成为共同语言,采用行政权力强力推行某种语言只能引起持其他民族语言的人民的反感。⁶列宁的民族语言政策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反对歧视和限制任何民族语言文字,不允许任何民族语言享有任何特权。第二,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三,各民族在自愿的基础上相互学习语言文字。⁷

十月革命胜利后第8天,即1917年11月15日,苏维埃政府就颁布了“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宣布各民族的平等和所有少数民族自由发展的权利。1918年10月31日,内战还未结束,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即颁布“关于少数民族学校”的决定。同年,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属下成立了用俄国各民族语言出版书籍的民族委员会。20年代,苏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广泛使用不同民族语言教学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在20年代初期,各民族语言取得了与俄语相同的法律地位。⁸

20 年代至 30 年代中期,苏联政府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如为发展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化,政府派出语言学家,帮助那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民族文字。到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政府先后给 52 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用 67 种民族语言进行电台广播,用 50 种民族语言上演戏剧,用 55 种民族文字印刷报纸,用 46 种民族文字发行杂志,用 52 种民族文字出版中学教科书,并在民族地区创办学校,建立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⁹可以看出,苏联建国初期的语言政策较好地体现了列宁民族语言政策的指导思想:强调语言平等,提倡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文字。由于俄语事实上的特殊地位,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文字,主要是指非

¹ E. Glyn Lewis, *Multilingu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Netherlands: Mouton & Co. N.C., Publishers, The Hague. 1972, pp. 25-44.

²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文出版社,2003年4月,第3页。

³ Michael G Smith, *language and Power in the Creation of the USSR 1917—1953*,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8, pp 15—17.

⁴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9页。

⁵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⁶ 《列宁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3页。

⁷ 1. 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第488页; 2. Lenore A. Grenoble, *Language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p.36

⁸ 各加盟共和国也先后通过立法的形式宣布民族语言是国语或较重要的语言。例如:拉托维亚(1918年1月)、乌克兰(1919年12月)、亚美尼亚(1920年12月)、巴什基尔(1921年7月)、楚瓦尔(1922年4月)、阿塞拜疆(1924年6月)和白俄罗斯(1924年7月)等共和国都通过了语言平等权利的决议。公文和教育工作采用的语言主要取决于公民的民族成分,教育用母语进行。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文出版社,2003年4月,第4—5页。

⁹ 杨玲:“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错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第115页。

俄罗斯民族学习俄语。

但也有观点认为，苏联成立后对不同民族身份的建构，使得普通民众原本已经模糊的民族身份意识又逐渐清晰起来。¹ 以民族构成作为冠名加盟共和国的组成依据，以及在初期推广的平等语言政策会无疑会强化各加盟共和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容易引发民族主义思潮，而这事实上不利于原苏联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

2. 30年代后期至斯大林去世

斯大林显然意识到苏联的联邦制，以及各加盟共和国以其民族语言为官方语言会强化民族意识，且不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1929年，斯大林发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其中对语言发展的前景有如下描述：

“当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十分巩固，……各民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本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各民族未来的大致图画，各民族在将来融合的道路上发展的图画就是如此”。²

这体现了斯大林在民族语言政策领域的指导思想：民族语言的消亡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民族融合的实现。30年代后期，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巩固，苏联政府于是开始在语言政策上体现建设所谓“苏联民族”的努力。³

在推广俄语之前，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政府曾试图创立并推广一种“融合语言”，即英语、法语、俄语甚至包括世界语的混合语言，来避免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斯大林于1935年提出这一思路，之后由语言学家 Drezen负责组织实施。然而1936年春天，“融合语言”即宣告破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愿意接受这一新“语言”。“融合语言”失败之后，苏联政府开始将使用拉丁字母的少数民族语言逐渐改为使用俄语字母。1936年5月，俄罗斯苏维埃首先评估了其境内少数民族使用拉丁字母的现状并批准以新的规范俄语字母来代替拉丁字母。1937年年底，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内的所有少数民族文字都由拉丁字母改为俄语字母。1938年3月，苏共中央及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在各加盟共和国及各地区学校开设俄语必修课”决议，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学生小学阶段学习结束时，应具备基本的俄语说读写的的能力，并满足从事办公室类工作的需要。1939至1940年，除格鲁吉亚及亚美尼亚外，所有使用拉丁字母的加盟共和国都转用俄语字母，以便俄语教学的实施。⁴

根据现有史料（包括西方学者的研究⁵），尚未发现最初4年加盟共和国对该语言政策的强

¹ 这里主要指与俄罗斯语言及文化都十分接近的乌克兰族与白俄罗斯族。Roman Szporluk 在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俄罗斯人与格鲁吉亚人、拉脱维亚人或者乌兹别克人完全不同：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自基辅罗斯时代之后（kyivan Rus）开始融合，至十月革命之前已长达三个世纪以上。由于密切的相互接触与共同生活，俄罗斯及乌克兰人曾被认为属于同一民族。在苏联其它民族中，只有白俄罗斯人有类似感受。因此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或者其中的绝大部分，并不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而是将乌克兰看成自己的祖国。只是到了20世纪之后，那种原本只在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的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的民族区别，渐渐成为普通大众的意识。其原因就是20世纪之后对两个民族的人为区别。见：Roman Szporluk, *Russians in Ukraine and Problems of Ukrainian Identity in the USSR*. First published in Ukraine in Seventies, 1975, p72. 引自：Roman Szporluk, *Russian,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2000 pp 71-107. 说明：Roman Szporluk,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乌克兰、俄罗斯、波兰史，以及马克思主义、东欧民族主义。

²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99-300页。

³ Roman Szporluk 认为，自斯大林开始，苏联政府事实上一直将通过语言同化、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阶级团结作为将各民族融为一体的风险最小的办法。见：Roman Szporluk, *Nationalities and the Russian Problem in the USSR*, 1973, pp 17-18, 载 Roman Szporluk, *Russian,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2000, pp 1-27.

⁴ Michael G Smith, *language and Power in the Creation of the USSR 1917—1953*,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8, pp. 155-156.

⁵ 指以下文献：

1.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烈反对。这里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自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强势领导人，尤其是30年代苏共党内进行的肃反运动压制了不同观点；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然而，从1946年开始，乌克兰党中央开始的反民族主义斗争显示不同声音的出现：从1946年至1948年，乌克兰党中央曾8次通过反对民族主义倾向的决议，并于1946年7月及1950年1月两次在全国公开批判了部分作家的所谓民族主义思想。与此同时，俄语教育在各加盟共和国全面展开。即使在像亚美尼亚这样的加盟共和国，其母语原来在国家各个领域都占主导地位，从1946年开始，俄语从小学二年级也开始成为必修课。而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历史教材都以俄罗斯为主进行重新编写。1952年10月苏联19大召开前后，苏联党中央进一步强化了反对民族主义倾向的运动。¹

苏共中央希望通过改变语言政策，逐渐使俄语成为全苏联的通用语言，这其实是合理的。² 问题在于，新语言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事实上违背了联盟宪法的原则，³ 也违背了列宁民族语言政策的指导思想。而语言教学与各民族文化与历史密切相关，容易引起非俄罗斯民族知识分子民族情绪的反弹。在斯大林时代，新语言政策的推行还比较顺利，除了上文提及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二战期间俄罗斯在战胜纳粹德国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提高了俄罗斯族在苏联各民族心中的地位。有学者认为，1945年至1948年期间，俄语在苏联成为广受尊敬的语言。当然，这与苏联政府发起的推广俄语运动不无关系：为了让各民族民众读到俄语读物，政府大量出版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的作品，仅在1949年一年就出版达4500万册。学校的俄语课教学更被赋予苏

2. E. Glyn Lewis, *Multilingu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Netherlands: Mouton & Co. N.C., Publishers, The Hague, 1972.

3. Isabelle T. Kreindler, e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Soviet National Languages: 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erlin, 1985.

4. Lenore A. Grenoble, *Language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5. Michael G Smith, *language and Power in the Creation of the USSR 1917—1953*,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8

6. Richard Pipes, *Russian Under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4.

7. Roman Szporluk, *Russian,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00.

¹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p.101–106.

² 苏联成立后，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及人口流动增多，客观上也需要俄语成为苏联的通用语言。斯大林也没有掩饰自己将俄语普及为统一语言的想法。1950年5—7月，苏联《真理报》开展语言学问题大讨论，斯大林亲自参与，通过发表文章及并采用回答读者来信的形式表明自己的观点。讨论结束后，1950年8月，《真理报》将斯大林参与此次讨论发表的文章及问答以《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出版单行本。斯大林曾两次以较长篇幅提及语言的统一问题。一是引述马克思有关论述：“引证另一句话，马克思在谈到统一的民族语言形成道路的问题时说：‘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另一处引用列宁相关论述。列宁在苏联建立初期，坚决主张各民族语言平等，反对给任何语言以特权。对此，斯大林特别指出“至于说列宁似乎否定了统一语言的必要性，那么就应当听一听列宁说的下面的话：‘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2012年4月17日查询）：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Stalin/mia-chinese-stalin-1950.htm>

³ 这里指联盟介入了本应由各加盟共和国管辖的教育事务。1936年版苏联宪法第14条（共28款）及1977年版苏联宪法第73条（共12款）规定了联盟政府的管辖权。与1936年版宪法相比，1977版宪法取消了加盟共和国以下权力：有权直接与其它国家签订条约、互派外交及领事代表及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但都保留了各加盟共和国制定自己宪法，拥有主权及退出联盟的权利。在两个版本的苏联宪法中，教育事务均不在联盟管辖范围内，且没有关于俄语地位的任何说明。而1936年版宪法第15条及1977年版第82条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其管辖范围内各项权力。也就是说，教育领域应由各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管辖权。苏联宪法的上述规定在加盟共和国宪法中也有相应条款。以乌克兰宪法为例，1939年版乌克兰宪法第19条第r款、1978年版乌克兰宪法第72条第13款均规定，教育事务由乌克兰独立管辖。参见：1. Aryeh L. Unger,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36 &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77”, i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New York: Pica Press, 1982, pp. 142-142, pp. 246-249; 2. *Ukrainian Constitution (1939)*, The American Russian Institution, 1950, pp. 3-4; 3. *Constitution of the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1978)*, Politvidav Ukraini Publishers, 1979. p. 44.

联爱国主义教育使命。¹

3. 赫鲁晓夫时代及以后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苏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措施。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抨击斯大林违背列宁确立的民族政策，声称社会主义并不是要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而是要繁荣非俄罗斯民族文化。² 当年6月，苏联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报》(Kommunist)全文发表了此前从未公开过的列宁“遗言”。“遗言”中，列宁指出要着重提防并反对大俄罗斯主义，而且“在向少数民族让步以及宽容方面，应该多做一些”。³ 苏共二十大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苏共中央将在民族政策上彻底纠正斯大林时代的做法。这无疑会强化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意识，并波及到民族语言政策领域，使得在斯大林时代受压制的反对意见公开化，而事实也证实这一点。这里举两个例子：

1956年10月，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召开上千人参加的乌兹别克知识界大会，时任乌兹别克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 Nuritdin Mukhitdinov 在会上宣布将为在斯大林时代遭迫害的乌兹别克作家及干部平反。他还明确指出：一直被许多苏维埃作家描述为落后地区的中亚其实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最古老的中心之一”。他号召乌兹别克知识界要承担发展民族文化、记载其精彩历史及培养民族干部的责任，并向参会者保证，过去在民族政策上所犯的的错误，以后再也不会重犯。⁴

在乌克兰，人们最初对苏共中央的“去斯大林化”将信将疑，但随后“各种抱怨以及要求如潮水般出现——一如人们预料的那样——是在文化领域……诸如‘保卫乌克兰语言’、‘讲乌克兰语’等口号在乌克兰越来越频繁地被人提起”。⁵ 斯大林时代被噤声的政治及文化界名人重新活跃起来，乌克兰语言、文学、经济以及法律方面期刊及杂志纷纷涌现，复兴乌克兰文化的各类活动也得到了乌克兰官方默许。1958年2月6日，乌克兰官方报纸《乌克兰真理报》(Pravda Ukrainy)发表署名文章，对俄语将来有可能替代乌克兰的前景表示担忧。⁶

上述对俄语化的质疑，主要针对俄语在各加盟共和国使用日益广泛、少数民族语言受到限制、以及学校教学中忽视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现状。自1938年起逐步确立、已经延续了近二十年的双语教学模式，即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学习俄语的做法，并没有受到影响。

而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却开始强化以加强俄语教学为途径的“民族融合”之路。1958年8月11日，苏共中央机关报《共产党人报》(Kommunist)发表署名文章，认为民族政策的重点应从鼓励发展各民族文化调整为加速民族融合，俄语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强有力的交流工具。文章批评一些少数民族同志，在经济以及干部政策上片面强调民族利益，在处理与文化有关的问题时违反党性原则。文章提出非俄罗斯族不应过分强调自己的民族特征，应该鼓励任何能促进吸收俄罗斯文化的努力。⁷

¹ Michael G Smith, *language and Power in the Creation of the USSR 1917—1953*,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8, p164.

²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秘密讲话，抨击斯大林粗暴践踏列宁确立的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声称社会主义“并不是要消除各民族之间的不同”，而是要“繁荣”非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见：Leo Gruliov, ed., *Current Soviet Policies II: Documentary Record of the 20t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1985, pp. 52-53.

³ 见：Kommunist, no.9, 1956. 引自：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119.

⁴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p.121-122.

⁵ Orest Subtelny, *Ukraine — A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 pp. 501-502.

⁶ Roman Solchanyk, Language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in Isabelle T. Kreindler, e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Soviet National Languages: 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erlin, 1985, p.74.

⁷ 该文作者 Bobodzhon Gafurov, 塔吉克人，在斯大林时代曾长期担任塔吉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发表该文时为苏维埃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参见：1.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 130; 2. James Bell “In Uzbekistan : Symbolic Tensions In Tashkent ’S Official Public Landscape”, *Ecumene* 1999 6 (2).

3个月后的1958年11月，苏共发布了教育改革方案。而其中关于俄语教育的条款“Thesis 19 草案”提出，儿童学两门语言再加一门外语负担过重，要求家长做出选择：**将孩子要么送到以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要么送到以俄语教学的学校。在俄语学校，民族语言将不再是必修科目。在民族语言学校，理论上俄语也不是必修课。**显然，这是一个不平等的选择，因为出于为孩子的未来着想，家长很可能选择俄语学校。这将会改变自1938年以来各加盟共和国的语言教学模式：即学校采用民族语言作为教育语言，俄语是一门必修课。¹

“Thesis 19 草案”公布伊始，就遭到绝大部分非俄语加盟共和国反对。1958年12月，最高苏维埃讨论“Thesis 19 草案”时，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吉尔吉斯均表示反对。格鲁吉亚代表 I.V. Abashidze 的反对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警告说：“我们不能以允许在俄语及民族语言之间选择一个的方式来使俄语及民族语言对立起来。”草案未获通过。会议遂将草案其交由各加盟共和国自行决定。²

在苏共中央的压力下，“Thesis 19 草案”先后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获得通过。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定于1959年3月讨论该草案，乌克兰全国作家协会于是定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开会之前召开乌克兰第四次全国大会。协会主席 Bazhan 在大会发表主旨讲话，他引用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论述来支持维护乌克兰语言地位的正当性。大会通过决议，谴责“Thesis 19 草案”。但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将“Thesis 19 草案”融合在一项总的教育改革方案中，并没有对其单独讨论。最终该教育方案获得通过并于4月17日在乌克兰开始实施。³

至1959年夏天，仅余两个加盟共和国，即阿塞拜疆及拉脱维亚没有通过该草案。6月，苏共中央换掉了大部分阿塞拜疆籍党的高层领导，而被革职的第一书记 I. Mustafeev 则被指控渎职，其中一条罪责是“在原本思想完全统一的语言问题上引起混乱”；另外一名被撤职书记则被指控“人为区分本地及来自其它地区的干部”。11月，拉脱维亚党中央书记 Kalberzins、总理 Vilis Lacis 等被撤职。除语言问题外，苏共中央还指责拉脱维亚领导层在经济政策上犯有错误。⁴至此，苏共中央提出的“Thesis 19 草案”在所有加盟共和国全部通过。

可以看出，苏共20大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领导的苏共，先是批判、清算斯大林背离列宁民族路线，声称要鼓励发展各民族文化，这无疑成为各加盟共和国民族情绪高涨的重要原因。但之后不到两年，便提出目的在于促进民族融合的语言改革方案“Thesis 19 草案”。在遭到各加盟共和国强烈反对、在最高苏维埃召开的相关会议没有通过的情况下，以将该草案交由各加盟共和国自行决定为名，通过施加压力，直至调整加盟共和国领导层来强行通过该草案。

赫鲁晓夫之后的其他前苏联领导人，延续了通过推广俄语、以利于加快民族融合的指导思想。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强化了俄语作为苏联人民“第二母语”的努力。1978年10月，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强化加盟共和国俄语教学的若干措施”，在加盟共和国采用俄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实施新的教学大纲，进一步强化俄语教学，并在俄语不是主要教学语言的民族语言学校设计了新的俄语教学大纲。⁵ 该措施可以视为赫鲁晓夫时代“Thesis 19”条款的进一步延伸。

¹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p 131.

²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Th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9 p 132-133.

³ 该教育法案的英文名称是“On Strengthening Ties between School and Life and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krainian SSR”。见：Roman Solchanyk, “Language Politics in the Ukraine”, in Isabelle T. Kreindler, e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Soviet National Languages: Thei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erlin, 1985, pp.75-77.

⁴ 1959年6月17-18日，阿塞拜疆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会，苏共中央委员 Mukhitdinov 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阿塞拜疆党中央大部分领导人都被撤换。12月11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主席 N.A. Ibrahimov 被迫公开承认他“在语言问题上犯了诸多错误”。Wolfgang Leonhard, *The Kremlin Since Stalin*, New York, 1962, pp. 345-346.

⁵ Lenore A. Grenoble, *Language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p.58

三、结论与思考

从第二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从斯大林时代苏共中央开始调整语言政策，到赫鲁晓夫时代提出的“Thesis 19 草案”，都引起了加盟共和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情绪。在斯大林时代，由于上文提及的多种原因，这种情绪尚未公开爆发。而在赫鲁晓夫时代，由于苏共中央对于斯大林背离列宁民族路线的批判，以及之后自相矛盾的政策导向，引发了部分加盟共和国民族情绪的强烈反弹。从现有文献看，各加盟共和国强烈的民族情绪主要来自知识分子群体，也包括各加盟共和国领导层。在赫鲁晓夫时代，虽然苏共中央通过施加压力乃至撤换主要领导人的方式迫使各加盟共和国通过了遭到广泛反对的语言改革方案，并以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思想”压制了加盟共和国民族知识分子民族情绪的反弹。但是，苏共中央能够通过组织管理手段，例如撤换加盟共和国主要领导人来实现其既定政策，但对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反对意见，虽然可以通过批判，乃至审判压制其声音，却不可能像斯大林时代那样使其噤声。例如在乌克兰，对于苏共中央语言政策改革的公开反对意见一直都在持续。方案通过后第4年，1963年2月11-15日，乌克兰知识界在首都基辅召开全国大会，与会者一致谴责了现行的语言政策，呼吁在乌克兰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教育以及文化的领域使用乌克兰语，并将呼吁书递交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¹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苏共中央自斯大林开始的对话言政策的调整，尤其是赫鲁晓夫时代语言改革方案，事实上对于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由于苏共中央的政策调整缺乏宪法依据，²也违背了列宁提出的民族政策，从而使得民族知识分子的呼声成为一种被压制的正当诉求，产生了很强的感召力。例如，1965年年底，乌克兰知名文学批评家及反对派知识分子 Ivan Dziuba 向乌克兰党中央及国家领导人转交了他在监狱中完成的《民族融合还是俄罗斯化》一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该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角度，阐述了列宁主义民族政策并分析了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等偏离列宁民族政策的错误做法。该书以大量篇幅批驳了苏联的语言政策。作者写道：“我们不得不指出，从形式上以及法律上乌克兰语言当然拥有全部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乌克兰语的二等地位……让人不得不产生怨恨。”收到该书后，乌克兰党中央以及政府在小范围内（包括乌克兰25个州的主要领导）散发了该书，该书后流传到上述范围之外。³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认为，语言政策背离宪法原则以及理论层面的民族政策，使得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情绪具有正当性并对在很大程度上对其起到了强化作用，是苏共中央在语言政策方面的主要失误之一。假如前苏联能够修改宪法，改变原有的联邦制性质，取消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以及可以退出联盟的条款，强调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将教育由联盟统一负责，⁴同时宪法

¹ 这次持续5天的大会由基辅大学及乌克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共同发起，可见其一定程度的半官方色彩。而参会者主要包括语言学家、大学教师、作家以及出版、报纸、广播电视从业人员。参会者甚至通过决议，要求当面向乌克兰党中央及政府表达反对俄语化、提高乌克兰语的四项诉求。参见：I. Bilinsky, *The Second Soviet Republic*,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33-34.

² 关于学校教学语言，1936年版苏联宪法第121条规定，“……确保学校教育以民族语言进行。”1977年版宪法第45条规定：“……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学校教学以民族语言进行。”Aryeh L. Unger,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36 & the USSR Constitution of 1977”, i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SSR*, New York: Pica Press, 1982. p.155, 242. 如此来看，在斯大林时代，联盟介入了本应由加盟共和国管辖的语言政策调整，这一做法不符合宪法规定。但就其调整内容而言，只是将俄语作为第二语言引入小学教学，并未违反“……确保学校教学以民族语言进行”这一联盟宪法要求。而苏共中央1958年12月提出语言改革方案，则变相违背了宪法上述规定。

³ Ivan Dziuba, *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 A Study in the Soviet Nationalities Problem*,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The Camelot Press Ltd, London and Southampton, 1968, pp. xvi, 150.

⁴ 1966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建立了苏维埃联盟教育部，将各共和国的教育部以及初等教育体系直接纳入其管理。有关非俄语学校的课程设计，俄语的教学学时，学制以及考试要求等，都纳入中央管理。在1930年代，斯大林将高等教育纳入联盟统一管辖，但也因此招致加盟共和国反对。Roman Szporluk, *Nationalities and the Russian problem in the USSR: A Historical Outli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7, no. 1.

明确俄语的地位与作用，那么，斯大林 1938 年开始的将俄语列为中小学必修课就完全合乎宪法原则。在坚持这一双语教育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俄语教育，使其逐渐成为苏联的通用语，将在有助于增进不同民族交流及融合的同时，最大限度缓解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思潮。¹

这里对前苏共中央在语言政策领域的另外两个失误做一简单概括。一是过分强调语言政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自斯大林开始，苏联政府“事实上一直将通过语言同化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阶级团结作为将各民族融为一体的风险最小的办法。”² 在乌克兰，“语言领域，是苏联领导层创造新的苏联民族与乌克兰人维持其民族认同的战斗前线”。³ 然而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对于人口规模较大、有特定文化传统、有民族聚居地域，特别是历史上曾建立过国家或曾谋求独立的少数民族来说，语言同化，未必就能实现其与主体民族的融合。以爱尔兰为例，在 16 世纪，爱尔兰语还是爱尔兰人的主要交流语言。17 世纪中期，随着克伦威尔征服、平定爱尔兰，特别是 1800 年的《联合法案》(Act of Union) 通过后，英国大力强化在爱尔兰的英语推广政策，到 1850 年，仅有 45% 的爱尔兰人还使用爱尔兰语，到 1891 年，这一比例仅为 19.2%。⁴ 然而，1922 年，爱尔兰依然通过武装斗争脱离英国赢得独立。

前苏共中央在语言政策的第三个失误，是双语政策仅针对非俄罗斯民族，不利于民族交融。俄罗斯民族是苏联事实上的领导民族，虽然没有这方面相关数据的统计，但一般认为，俄罗斯民族在各加盟共和国领导及管理阶层、甚至警察队伍中所占的比例，要高于其相应的人口比例。⁵ 但是，俄罗斯人学会使用当地语言的比例很低。有学者对 1970 年前苏联人口统计进行了分析：生活在非俄罗斯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占非俄罗斯共和国总人口的 22.9%，但其中只有 3% 能讲所在地区的语言，⁶ 这显然不利于俄罗斯人与其所在共和国民族群众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四、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前苏共中央在语言政策领域的失误以及其与非俄罗斯共和国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除语言因素外，文化领域的其它因素以及政治、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同样会引发民族主义情绪，在很多情况下，民族主义情绪可能是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或者一种因素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另一个因素上得到更多反映。康纳 (Walker Connor) 曾提出：“观察者往往未能感受到种族民族主义倾向的抽象本质。因此不难理解，在研究某一族群不合的实例时，研究者更倾向于从易于识别的特征来对其进行分析。因此，乌克兰的动荡往往被解读为抵御俄语

1973, p.37.

¹ 那么，从 1923 苏联成立，至 1989 年解体。苏联有没有机会对宪法做如上修改，以实现列宁提出“达到愈来愈紧密的联邦制同盟”呢？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地位，而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假如斯大林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调整，把苏联转变为单一的共和国，最终完成各族的政治整合，结束列宁提到的“过渡”时期，在当时的苏联的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下，这样做应当不会有什么阻力。所以在二战结束之后的 40 年代后期，是苏联修订宪法、使联盟-联邦制转型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最佳历史时机。见：马戎，“斯大林是否在民族问题上犯了历史性错误？”《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46 期（2008 年 2 月 20 日）。

² Roman Szporluk, “Nationalities and the Russian Problem in the USSR”, 1973, pp. 17-18, 载 Roman Szporluk, *Russian,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2000, pp. 1-27.

³ Orest Subtelny, *Ukraine—A Histo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 p. 525.

⁴ Riagian, Pdraig O. *Language Policy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reland 1893 – 199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5.

⁵ Roman Szporluk, *Russians in Ukraine and Problems of Ukrainian Identity in the USSR*. First published in *Ukraine in the Seventies*, 1975, p71. 引自：Roman Szporluk, *Russian, Ukrain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2000 pp. 71-107.

⁶ Ruslan O. Rasiak, “The Soviet People: Multiethnic Alternative or Ruse?” in Edward Allworth, ed., *Ethnic Russia: The Dilemma of Dominance*, New York, 1980, p.166.

入侵、维护乌克兰语的努力。”他进而质疑，“语言是乌克兰民族认同的基本要素呢？还是语言其实是一个次要要素，只是在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斗争过程中，上升为民族的象征？”他的结论是：“即使语言、宗教、经济地位，或者其它任何可以识别的文化特征都发生巨大变化，民族认同也许会依然存在。”¹当然，民族认同不等于民族分离主义，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当然会有自身的民族认同。这里，本文从另一个角度解读 Walker Connor 的上述观点：少数民族本身的语言、宗教、经济地位（当然是提高）等的巨大变化未必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决定性要素。从这个意义来说，或许可以对前苏联在语言政策领域的失误归纳如下：过分重视语言的作用，以致超越宪法授权，希望通过推广俄语来加速民族融合的过程，但反而引发少数民族民族情绪的激烈反弹，强化了业已存在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成为前苏联解体的文化因素之一。

【译 文】

《多民族国家：列宁与斯大林时期的帝国和民族构建》²

A State of Nations: Empire and Nation-Making in the Age of Lenin and Stalin

Ronald Grigor Suny & Terry Martin 主编

Introduction（导言）

Ronald Grigor Suny & Terry Martin 著，孙昉译³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历史研究者曾经热衷的关键词汇已然转变。“国家”和“社会”，“知识分子”和“贵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曾在一系列的论辩中被交替审视。但随着学者开始质疑社会范畴(social categories)的相对稳定性，并且思考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范畴时，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认同、叙述以及意义。在此过程中，此前研究中适用的关键词汇就出现问题了。历史学家们对阶级利益越来越丧失兴趣，而民族——这一之前关注度少得可怜的话题，转而成为新的研究焦点。在数十年的俄罗斯中心主义（Russocentric）“垄断”之后，为数不少的历史学者开始关注非俄罗斯的其他周边群体，或是研究针对其他民族(nationalities)的“宗主”政策(metropolitan policy)。本论文集中，帝国、民族与国家是各项研究的关键词，学者借以探索苏联各民族的权力关系以及权威的代理者。编者和作者一直希望能够对苏联这个多族群国家的历史进行新的阐释，本书即是一个开端和尝试。

作为理解东欧共产主义的尝试的一部分，有关苏联的较为严谨的学术研究发端于冷战初期。学者们争先进入“地域研究”。苏联研究与东中欧国家的研究相伴而生，被用来审视发生在这块大陆上的新的政治分裂。然而，讽刺的是，那些在“欧洲的其他部分”辛勤耕作的人通常将自己的研究限定于单个国家，“俄罗斯研究者”们倾向于只耕种自己的地盘，满足于将外围的“非俄”田地撂荒。而此后恰逢学者们研究中的男权主义倾向，有关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研究都毫无愧疚地无视加盟共和国在族群和政治上与俄罗斯的分歧，同时无意对俄罗斯性这一范畴进行解释。位于俄罗斯和苏联研究核心的是一块未被发掘的俄罗斯和非俄罗斯的民族认同史。在 1970 年代中

¹ Walker Connor, Nation-Building or Nation-Destroying, *World Politics*, Vol. 24, No. 3, Apr., 1972, pp. 336-338.

² *A State of Nations: Empire and Nation-Making in the Age of Lenin and Stal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³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1 级博士研究生。

期以前，主流“苏联学”专家关注高层政治、经济发展和对外政策，而无论是地理还是智性方面的民族研究都属边缘。除了极少数例外，非俄罗斯的民族或被排除在主流叙事话语之外，或成为政治操纵和中央指令的对象，他们时而被描述为俄罗斯化的受害者，时而则是中央权威的现代化计划中遭到同情的、过时的姐妹；民族之间是同质性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区别被淡化；族群文化之间的适应性变化（mediation）很少得到关注，政治压迫和经济发展似乎足以解释苏联体制内的非俄罗斯民族的命运。而研究多个民族往往成本高昂，在语言上也很难成行，所以研究者往往选择单个民族为研究对象。

当西方学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将目光投射到俄罗斯以外的民族时，他们的声音与声称“民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苏联迥然相悖。无论是慕尼黑研究所对苏联问题的鲜明指控，还是 Walter Kolarz 或 Richard Pipes 更为温和的研究，苏联均被表述为一种帝国的安排，俄罗斯与其边疆的殖民连接。苏联作为一个帝国的概念具有相对意义，但这个帝国的特质需要更为详细的调查和理论表述。之后，在很多学者的观念中，民族是没有疑义的范畴，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本质的自然反映和表述，而民族的本质并不需要历史性解释。这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尽管并不都认同单一的帝国视角，甚至认为苏联不应该被铁上帝国标签——通过关注历史中的偶然、民族主义以及民族认同的演化特征，都涉及帝国的统治（规则）问题。

迄今为止，历史学家派勃（Richard Pipes）的《苏联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是早期最有影响的民族问题力作。由于资料丰富，对边疆的论述权威，此书成为苏联历史学者阐述“民族问题”起源的标准话语。虽然作者似乎避免作出解释，此书有一个清晰而引人注目的论辩：革命导致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互斗争，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俄罗斯对非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者的军事征服。从 1991 后的视角来回顾的话，Pipes 的论述似乎被证实——中央政权对非俄罗斯的边疆进行的人为和非法的强行吞并，在中央政府疲弱的时刻被推翻，而被禁锢的人们在自由时期最终意识到了“自然的”意愿。边疆民族重新上演发生在 1917 年至 1921 年间的欲望和冲突，好像过去 70 年间苏联权力的干预没有发生一样。一面是法律和道德，一面是为了赤裸的权力而自私地操纵理想。在这个框架下，很难想象布尔什维主义所到之处并非都被认为是非俄罗斯的活动者的敌人，有时相对于个别民族精英提出的以农民为多数群体的民族独立，甚至是他们更乐于接受的选择。在内战的风暴中以及之后，革命者、“民族的布尔什维克”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建立了复杂的联盟。这种探讨苏联民族政策的视角没有涉及苏联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国家计划。事实上，在 Pipes 先驱性的著作之后，很少有苏联民族政策的研究涉及苏联 1920 年代的本土化（*korenizatsiia*）政策。但是，Pipes 对非俄罗斯分离主义者的关注提醒我们，布尔什维克继承了一系列严峻的民族问题，这些问题深藏于其所控制的政权之下，并构成社会不稳定的来源。

Pipes 的观点与他哈佛大学研究社会科学的同事们截然相反，后者均认同当时主流的现代化理论，认为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业化和现代科学的发展都将以同样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社会。其中一种进路就是亚（substate）“族群”或“部落”认同逐步让位于共同的公民国家认同。Inkeles 和 Bauer 的《苏联市民》（*The Soviet Citizen*）便是此方面的经典之作。此书基于哈佛访谈项目所收集的大量资料，认为“如果要预测个体的生活机会、对政权的态度和大致的社会政治价值观，相对于社会阶层身份这一指标，族群认同的重要性要低得多”。这并不是说民族在所有方面都无关重要。相较于俄罗斯人，民族性在乌克兰人的生活中更为重要。例如，两倍于俄罗斯人的乌克兰人同意在莫斯科投掷原子弹！然而，这项研究证明了苏联社会是相对稳定的，民族问题并没有威胁到这种稳定。

现代化模式在 1960 年代非常流行，很多学者认为用之描述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要优于竞争性的极权主义模式。事实上，在 1960 年代，苏联常被视为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替代模式。两位

英国学者 Alec Nove 和 J. A. Newth 在反思 1960 年代对“发展”问题的讨论时，将苏联的经济和社会成就与其南部的邻国相比，认为对于苏联南部的加盟共和国来说，在与俄罗斯的联盟中他们是绝对的受益者。有证据证明这些地方，特别是中亚地区的工业化得到了俄罗斯的经济援助而非剥削。尽管不愿将这种关系视为中央对边缘的“殖民”，Nove 和 Newth 指出莫斯科掌握着决策权：“因此，如果我们不能以殖民主义指称现存的关系，我们应该发明一个新的名称来描述这种从属的，但在本质上不同于此前的帝国主义的事物。”

无论是对苏联民族政策大体上消极的或者更为正面一些的评价，苏联学研究经常被对苏联实践的激烈的公众道德批判所型塑。个别研究者更为中立和疏离的立场在其专业圈子受到质疑。不过，截至 1970 年代，对早期苏联民族政策和具体民族的研究工作都在为“范式转移”做准备，无论是对民族构建还是破坏的描述，其中都体现了逐渐从恶意的操纵、压迫和通过俄罗斯化和现代化取消民族性的故事转向保存和转型的叙述性话语。一些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深入追溯了 1920 年代的历史，其中 Zvi Gitelman 对共产党中犹太人（Jewish Sections）的分析和 Gregory Massell 对苏联在中亚地区实行的妇女政策的探索影响力最大。Gitelman 和 Massell 均讲述了共产主义试图在传统的族群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故事，并且二人都发现“现代化与保存族群风貌并行”的努力最终破产，原因在于党的发展规划，和少数族群的利益以及保护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严重错位。世俗的犹太共产党人无法摧毁犹太教，而中亚本土民族和俄罗斯族共产党人则更加令人惊异地无法根除面纱和其他“封建”习俗，最终不得不奇妙地包容了传统社会。

截至 1970 年代中期，在公正的观察者看来，民族问题在苏联并未消失，反而像是成为苏联政治中的永存事实。1974 年，Teresa Rakowska-Harmstone 发表了一篇影响力深远的文章，此文兼具历史深度和社会科学的复杂性。通过运用“话语”分析解释“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间愈加张扬的族群民族主义”，作者阐述了“在工业化和大众教育普及以及加强的社会主义化过程中展现出的强权的整合力量如何与联邦制行政架构相对抗”，“联邦制的行政架构保护了边境地区和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官方族群文化机构，因此成为“可被彰显”的民族态度的基础。通过区分“正统的（规范的）”和“非正统的”（不规范的）的民族主义，前者为制度所允许，后者则声称对意识形态保持疏离、独立以及拒斥，作者展示了共和国中本地的族群精英如何在“他们自己独特的民族遗产”中寻求“合法性来源”以及通过熟练操纵被允许的“民族主义”来与民族性建立联系。在许多非俄罗斯的共和国中，族群权力和意识的巩固被“大俄罗斯持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主义以及俄罗斯对少数民族所展现的民族沙文主义”所抑制。无论此政策的政策目标是什么，事实上民族融合和民族主义压迫均在增长，并且“因党的政策而处于冲突状态”。政治学学者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在随后的十年间大量涌现，到 1984 年，Gail Lapidus 开始进入这块已被前人开垦的土地，进行她在民族问题领域的著名研究。

在始自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Elie Kedourie、Ernest Gellner 和 Karl Deutsch 的研究），直到 1990 年代中期的研究中，民族主义、民族理论界的转换逐渐成为专家学者们的流行观点。然而，苏联学专家和苏联历史学家中却很少有人对此有回应。从将民族看作是种族的古老的和自然的区分的倾向，深入发展到现代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悄然出现，民族主义的分析学者发展出了一个现代社会和文化构建的民族典范模式。新近对“民族属性”（nationness）的研究认为，诸如亲属、家庭、民族和民族国家是在复杂的社会和政治过程中建构（或发明）出来的，远非人类关系的自然组成，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以及更为宏阔的经济力量起到了形塑的作用。无论是有害理想的产物（Kedourie）还是工业主义的功能要求（Gellner），或是日益密切的“社会交往”的结果（Deutsch），民族国家均被构想为人类干预的产物，并且这种干预仅仅于 19 和 20 世纪在普罗大众间得到了有力呼应。这些作者认为，民族主义促生了民族国家，而非相反。

在理论讨论之外，很多苏联学家未加批判地接受一种常识意义上的民族观念：一个相对可观

察的、客观的现象，建立在由语言、文化和共享的神话或亲属起源，（有时包括）领土组成的共同体之上。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主义的爆发正值民族主义的新理论正在启动第二轮范式转移。大众传媒和一些学者以旧有的方式解释了这些事件，视之为被压迫的欲望和利益的苏醒，盖子被拿走（或因强力被吹走）后沸腾的水壶。然而，更为有趣的是，有一种将最新的社会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结合的趋势。政治学家 Philip Roeder 和 Rogers Brubaker 均采用制度分析，强调布尔什维克建构的民族制度和民族精英在保护民族意识以及提供允许快速民族动员的制度方面所起的作用。历史学者 Ronald Suny 和 Yuri Slezkine 运用前人研究，对布尔什维克鼓励民族意识和一种原始内在的族群性的方式进行了总体阐述。然而，通常历史学家的工作要更慢一些，本书收录了有关民族问题和苏联前半段帝国时期的第一代档案研究。

布尔什维克不仅从旧政权中继承了“民族问题”，也接过了国家和官僚体系处理民族问题的传统：一些处理方式或者干脆忽略民族问题。因此，本书以 Ronald Suny 对革命前俄罗斯所实施的帝国式的、民族策略的统治进行的宏阔分析为开篇。Suny 勾画出了帝国的纯粹类型：存在（employ）族群区别和阶层不平等的混合政权。随后他运用此模型将海外帝国与较少得到研究的陆地帝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相区分，前者作为宗主国的民族-国家控制着地理上分离的殖民地，后者如俄罗斯、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其中帝国的和殖民地的人民趋向融合，帝国和民族认同的区别随之更加模糊。此外，鉴于俄罗斯的落后，19 世纪民族主义出现之前，沙皇在语言和文化同化方面的成就远低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西方君主制国家。因此，在沙皇为数不多地几次开展俄罗斯化时，结果遭遇到帝国的西南边疆——波兰，芬兰，乌克兰，拉脱维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更为先进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坚决抵抗。Suny 最终结论认为沙皇俄国没能从宗教、王朝或政权认同中自主地发展出强大的、连贯的、被广泛接受的民族认同，这也导致其政权在一战的强大压力下于 1917 年崩塌。

1917 年 10 月，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彼时，他们接管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多族群国家，西部和南部边疆的民族主义运动势头凶猛，东部较为温和，中部人口最多的俄罗斯族民族意识则相对较弱。尽管 Terry Martin 谈到列宁和斯大林对国家所面临形势的理解大不一样，但他们都震惊于奥匈帝国的崩溃，加上三年艰苦的内战，都认为民族主义是严峻的威胁，认为格外强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力量，将会引发其他民族的保卫性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威胁国家统一，因此有意尝试建立一个反帝国的国家，或者用 Martin 的话来说，一个“肯定性行动的帝国”（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他们支持非俄罗斯的地区、精英、语言和文化制度的创建和发展，同时压制俄罗斯的民族制度和制度，后者甚至成为替罪羊。他们相信这种策略能够消解民族主义，同时能够建立一个统一的、高度干预的、多族群的社会主义国家。布尔什维克保持了 Ronald Suny 在所有的帝国中发现的族群区分原则，但是颠覆了传统的族群等级，在其中“建立了国家的民族”（state-bearing）的声誉远高于“殖民地”人民。以此种方式，他们希望在后帝国时代的民族主义时期，依旧能够保持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完整。

许多分析家都困惑于苏联领导人努力在苏维埃联邦层次上建立民族认同，然而最终失败的结局，民族被限定在亚层次。与英国、南斯拉夫、印度、美国不同，“苏联”从来没被认为是一个族群或民族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被看做是延续了 Suny 所谈到的沙皇民族国家构建模式。但是，Joshua Sanborn 告诫读者不要将民族（nation）与族群（ethnic nation）混为一谈，也不要认为在沙皇帝国和苏联中，统治者找到了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国家而非帝国的或族群国家的基础。尤其是，面对艰巨的征兵和战争动员的任务，现代化的军队试图构建非族群的民族凝聚力。沙皇和苏联军官都用家庭的比喻建立士兵之间的亲密纽带，通过为军人家庭提供口粮将家庭和军事连接在一起。Sanborn 追溯了始于沙皇时代，伸延至整个革命时期的父权到兄弟的图式转变，后者强调团结，平等和忠诚——与国家（nationhood）的主题词呼应。Sanborn 的分析表明，苏联政治共

同体的建立与其它国家的构建过程相类，即使它抛弃了“民族”这个关键术语。

Daniel Schafer, Adeeb Khalid, Matt Payne 和 Douglas Northrop 运用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独道地阐述了苏联政府对民族领土、精英、语言和文化形成的支持性政策，以及意料之外的社会后果。Schafer 研究了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的建立和解体，展示了新起步的族群领土化过程之复杂和模糊性。他的文章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此前学者对苏联分而治之政策做出的评价。与谨慎的、深谋远虑地将穆斯林民族彼此分离不同，尽管出于对民族领土的大致承诺，内战时期的苏联政策此处看来更像是即兴而为。其中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并非针对突厥人的民族构建，而是反对整个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Schafer 并不认为苏联精英工具性地构建了巴什基尔认同，相反是源于巴什基尔的游牧传统，他们对土地的共享权利以及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与中亚一样（见 Khalid 的文章），巴什科尔托斯坦的政治较量呈多极化，当地巴什基尔人，当地俄罗斯共产党，中央苏联政权，白人力量和俄罗斯定居者都提供了上演欺骗、误解和倒戈这些所有可能性的情境。Schafer 的文章还展示了在多族群杂居地区，民族领土的形成如何成为族群动员和民族意识急剧增加的来源。1917 年前，巴什基尔认同或许是微弱和潜在的，但一旦布尔什维克政策支持民族领土形成，巴什基尔领导人 Ahmed Zeki Validov 便受到广泛欢迎。这主要是由于巴什基尔认同中一个主要信念：我们不是鞑靼人。在 1920 年代，数万计的民族领土建立，其中许多小到一个村庄。Schafer 所描述的发生在巴什科尔托斯坦的事件在整个苏联境内反复上演。其结果不仅是统治者意愿之外的民族意识增长，还带来了其更不愿看到的族群冲突和民族动员的发展。

Adeeb Khalid 将我们的关注点从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的突厥穆斯林民族引向与之截然不同的中亚突厥穆斯林，同时话题也由民族领土转向民族精英。早前的学者多运用土耳其语的研究文献质疑俄语研究，Khalid 则从通常的俄罗斯与穆斯林相互对立的叙述角度转向一个多极化的故事：Jadids（穆斯林改革者）与保守的穆斯林乌理玛（Ulema 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中亚俄罗斯人对穆斯林的袭击，本地俄罗斯人占统治地位的苏维埃政权与莫斯科的冲突，以及 1919 年以前苏俄与激进化的反帝的 Jadids 之间的战略性同盟。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桩便利的姻亲提供的珍贵的受过教育的中亚人满足了彼时其新成立的民族领土的人事需求，而在与保守的穆斯林反对者较量中败下阵来的 Jadids 也需要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以获取实施改革理想的政治权力。在 1920 年代的整个苏联，伴随着 Schafer 的民族领土化故事，Khalid 的故事也以不同形式频繁上演。最终，在每个加盟共和国，布尔什维克都能找到受过教育的，合格的且按政策规定只能由非布尔什维克的民族（通常是民族主义）精英担任的国家“干部”，同时在莫斯科新的激进的统治之下，本地的民族主义者为其民族构建计划建立了令人惊异的同盟。然而这桩婚姻并不平等，当布尔什维克成功地教育和培训了新的忠诚的非俄罗斯的精英时，他们逐步摆脱——在很多案例中，逮捕了一早期的盟友，这发生在 1928-1930 年，1932-1934 年和 1937-1938 年的清洗运动中。对民族精英的盟誓，尽管坚持到了斯大林时期及其后，但却不是民族自治，甚至不是“民族共产主义”的许可证。

Douglas Northrop 有关乌兹别克斯坦的性别和族群性的研究强调了民族文化和苏联“文化革命”的复杂性。Sheila Fitzpatrick 借用这个布尔什维克短语，以指称 1928 年至 1931 年间斯大林所发动的“社会主义进攻战”，其内容包括快速工业化、取消私企和民间贸易，农业集体化，以及公共、学术和职业各领域的彻底革命化。文化革命不仅指一种途径——阶级斗争和鼓励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支持者们的自治行动——同时也是一种情绪：一种广为传播的坚信落后的社会很快就能通过革命而一跃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乌托邦信念。没有什么比布尔什维克自己的宣传更贴切“文化革命”意涵的了，用当时的语言说，“文化上落后的东方的”民族地区。Suny 的文章表明在民族主义时代，帮助“落后的”殖民地文化发展是一种典型的晚期帝国主义获取合法性的行为，因此苏联的肯定性行动将发展主义进行得如此极端也就不足为奇了。Northrop 谈到了乌

兹别克斯坦对苏联政策的激烈对抗。乌兹别克族以性别不平等和被视作落后的、肮脏的和压迫性的妇女隔离为特征。为了使苏联东部尽快现代化和文明化，共产主义不得不消除这些对民族认同而言具本质特征的社会实践。这就给了那些抵制苏联现代化的人以“民族”的旗帜为理由武装自己。Northrop 叙述了苏联试图渗透并改变乌兹别克的性别关系的行动，向我们展示了即使是被视为最暴力和“集权主义”的国家行动在改变日常生活传统模式中遭遇的困境。

Matt Payne 提供了一个哈萨克斯坦地区布尔什维克民族精英形成早期的个案，该个案虽出人意料却颇具启发性。在 1920 年代，作为其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倾向招聘工人来担任原有的和不断新设的政府行政工作。然而，在哈萨克斯坦和许多非俄罗斯地区并没有本地无产阶级，因此，吊诡的是，民族精英形成的第一个阶段是无产阶级化。在建设土西铁路（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时，政府倾向于雇佣哈萨克工人。但是，将游牧民族转变为拿薪酬的工人这一举动遭到了传统的哈萨克人、土西铁路管理者和欧洲工人的抵制。对哈萨克族的倾向性政策激怒了非哈萨克工人，歧视、族群成见以及对有限的工作和利益的持续竞争，导致了激烈冲突、凶残斗殴甚至社会骚乱。Payne 笔下的此类事件在苏联东部的民族地区很常见，虽然其它地区的冲突没有像在哈萨克斯坦那样激烈和复杂。在充满敌意和困难的情况下，新形成的哈萨克无产阶级在老练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俄罗斯工人中找到了同盟，后者以其仅能做到的方式帮助他们适应新形势：即教育他们成为语言和文化上的“俄罗斯人”。因此，苏联政府完全出于培养哈萨克无产阶级的行动，其结果却产生了强有力的俄罗斯化（Russification）。虽非本意，但从苏联的视角看，这一结果并非不受欢迎，因为苏联获得了这些“哈萨克人”兼“布尔什维克”，其中很多人将在哈萨克政权中担任要职。

1932 年文化革命结束之后，社会和文化政策趋于保守，在一系列变化中，进步教育的衰落，堕胎非法化，以及艺术由先锋转向现实主义较具代表性。这段时期内苏联的多族群统治政策也发生了根本转变，部分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政治的保守趋势。然而，正如 Schafer, Khalid, Payne 和 Northrop 列举的那样，此种情形也源于苏联早期政策所造成的紧张局面和意料之外的后果。**族群领土化的本意是消解民族主义，但其实质却加强了民族主义，加剧了族群冲突。**对少数族群的优惠政策（肯定性行动）也有类似后果。苏维埃的发展主义在中亚遭到的是抵制和反抗，而非感激。现在我们所熟知的策略性的族群性现象，其中个人利用其民族认同获得好处，同样也是布尔什维克不乐见的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而非理性行为。这些问题都是现代的多族群国家所特有的；民族问题应该被管理而非解决。然而，布尔什维克并不这么认为。或许最让斯大林担忧的，是他越来越相信与民族精英的联盟会导致布尔什维主义的民族化（nationalization），而非各民族的布尔什维化。在 1928-1933 年的大饥荒中，此种怀疑达到最高点。当时，中央政府将乌克兰对中央征粮的抵制，解释为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发展的后果，并在 1932 年 12 月 14 日政治局重要会议上通过了斯大林亲自修订的方案，对实施乌克兰化过程中的错误进行批评。此项决议引发了苏联民族政策的重要调整。

学者通常认为此次变化标志着本土化的结束以及转向俄罗斯化。这种说法有夸张之嫌。Peter Blitstein 对 1938 年通过的非俄罗斯族学习俄语的法律进行了详细的个案研究，他认为立法的目的并不在于实现语言或文化上的俄罗斯化，而是强化多民族国家中俄语的通用语角色。法律并没有取消民族语教育，只是规定小学教育中俄语为必修课。比通过这项法律更让人惊异的是，迟至 1938 年，在相当多的非俄语学校中，压根没有俄语课程科目。Blitstein 提到了立法通过后，资源投入的匮乏导致了糟糕的俄语水平。此外，苏联教育中有另一项更为重要的，实施至斯大林去世前的语言政策：要求各命名民族（titular nationals）（如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族，鞑靼斯坦的鞑靼族）去本民族学校学习。尽管在实践中此项政策经常不能严格执行，但只有到了后斯大林时期，随着 1958 年的学校改革，非俄罗斯族的孩子才有机会接受俄语教育。斯大林时期的教育制

度很可能妨碍了语言上的俄罗斯化，在赫鲁晓夫和勃日列涅夫时期，为了让孩子将来的社会发展更为顺利，成千上万的父母将子女送入俄语学校。

David Brandenberger 的文章讨论了 1932 年 12 月政治局决议之后发生的最为戏剧性并在二战时期得到强化的现象：俄罗斯传统文化复兴以及俄罗斯族被视作苏联的领导民族，“兄弟势均，长者为先”（the first among equals）。Brandenberger 将此解释为政权构建和获取合法化的政策，强权（Great Power）而非露骨民族主义得以产生。在斯大林看来，最初轻视俄罗斯文化，不鼓励俄罗斯民族意识的策略没有达到创建统一政权的目标，需要一种全新的统一原则。Brandenberger 回顾了参战动员对历史的运用，对“我们伟大的祖先”（几乎全是俄罗斯族）的祈求，以及对之前受到谴责的俄罗斯帝国主义（“较少的罪恶”理论）的颂扬。一些俄罗斯中心主义的学者力图对沙皇和苏联历史做亲俄的中央集权的解释。优秀的历史学家 Anna Pankratova 和她的研究队伍写出了作为俄罗斯殖民主义关键环节的哈萨克斯坦史，却被谴责为反俄。与之同时，俄罗斯的英雄和历史在整个苏联联邦中得到颂扬，而非俄罗斯族的英雄只能局限于加盟共和国内，且其地位也不同。Pankratova 举例说到：非俄的英雄及其故事情节绝不能是反俄的，而应是支持苏联作为“人民的朋友”这个新权威的多族群形象，在其中俄罗斯占据一统地位。

俄罗斯族的地位，以及与之相伴的苏联统一原则的改变，一方面体现了 1930 年代苏联政策的新动向；另一方面标志着“敌对民族”范畴的出现，以及仅仅基于族群认同的对个人和民族恐惧的增长。Peter Holquist 的文章富有创见地探索了这种破坏性政策的根源，无论其对象是阶层，种族，族群或其他社会范畴。他向我们展示了在 19 世纪的欧洲，国家公职人员以及学者怎样开始将市民构想为集聚的人口并加以调查和统计，以方便国家对人口规模进行科学干预和形塑，Holquist 称之为“人口政治学”。这项社会性工程有可能采取“积极的”形式，如苏联早期的以阶级和民族为基础的肯定性行动政策，也可能是一种“消极的”干预，用来削减、清除或消灭不想要的人群：1860 年代早期的西部高加索人；一战期间中亚一些地区的土著人；1919-1920 年间顿河和捷列克的哥萨克人；1925 年车臣的“土匪”，以及二战期间被视为叛徒的民族。Holquist 的结论指出，暴力通常被观察者当作布尔什维克的核心特征，但应该在更宽广的视角下审视暴力，应将暴力看作新的社会构想和国家干预技术的产物。

在苏联早期，民族并不是消极的人口政治的对象。哥萨克指的是反革命地区，而非族群。事实上，在 1920 年代，苏联政府对散居的族群—先是犹太人，接着是其他许多族群—实施了“积极的”迁徙政策，以便集中人口，形成民族领土。然而，在 1930 年代，一些特定民族成为消极的人口政治对象，其手段包括族群清洗，逮捕和大规模处决。主要原因是苏联试图通过积极的民族构建政策对邻国施加影响。这些邻国主要位于苏联西部边境，是芬兰人/卡累利阿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罗马尼亚人/摩尔多瓦人跨境生活的地方。在 1920 年代，苏联希望其民族政策等能够帮助芬兰、波兰和罗马尼亚等邻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进行革命。并且，此目的在相当程度上也达到了。然而，相信跨境族群关系的政治性联结暗示了影响也可能以反方向发生。随着 1930 年代极端民族主义在几乎所有的东部和中部欧洲国家取得胜利，以及苏联内部日益增长的惧外心理，苏联领导者相信一种颠覆性力量正从西方传向东方。1935-1938 年间，至少 9 个“散居”（diaspora）民族——芬兰族、爱沙尼亚族、拉脱维亚族、立陶宛族、极地族、德意志族、库尔德族、汉族以及朝鲜族被迫迁离苏联边境。1937-1938 年的恐怖时期，仅仅是基于其族群认同，政府又对以上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如希腊族和保加利亚族）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几乎占到这两年内苏联所进行的 680,000 起处决的一半。事实上，在大恐怖的最后几个月，散居民族几乎是唯一的受害者。这是一种超常的、没有预想到的发展。

在二战期间，伴随着俄罗斯中心主义的舆论宣传，苏联的民族主义恐怖极度扩张。1941 年 6 月德国入侵苏联，德意志族很快遭到驱逐。1943-1944 年间，在德军被赶出之后，6 个民族的全

部人口——所有男人、女人和儿童——因被指控外通敌军而流放到西伯利亚或中亚：克里米亚鞑靼人、梅斯赫特土耳其人、卡尔巴达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和卡尔梅克人。前三个民族讲土耳其语，可被看成是土耳其族散居人口，而后三个均是苏联土著民族。此次流放标志着苏联民族恐怖活动的加剧。随后，在成立不久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境内的苏维埃化，也导致了 1944-1945 年间的大规模驱逐。严格的说，这些倒不是民族驱逐。1918-1921 年和 1928-1933 年间，全苏联都上演着大规模的逮捕和流放事件。然而，由于战后俄罗斯族不再是驱逐对象，并且苏联此时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将自身认同于俄罗斯族的民族性，所以那些遭到驱逐的受害者们便认为自己受到了俄罗斯帝国权力所施加的民族压迫。

这种想法并非空穴来风。1948 年 11 月，苏联出台法律，将流放人群分为两类：暂时流放和永久流放。前者主要是不涉及民族身分的流放者，包括 1930 年代被驱逐的“地主”和 1940 年代被流放的 Vlasovites 人（那些协助德军作战的人），事实上，在斯大林去世前，这些人都是自由民。后者则包括了所有被流放的民族成员，如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西白俄罗斯人、西乌克兰人和摩尔多瓦人，尽管这些人已被作为地主、Vlasovites 叛徒或“土匪”被驱逐出境了。因此，他们的流放是民族性质的，并且在斯大林去世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仅仅因为其民族身份被驱逐。最终，战后政府开始了对闪米特族的压迫，尽管这在苏联早期被视为反动的、反革命的、粗鲁的和禁止的。讲意第绪语的知识分子阶层被悄然指控和处决，同时，喧闹的“反世界主义”运动旨在恐吓和污名同化了的犹太知识分子及被认定为其同盟的世界主义者。

1930 年代中期，舆论宣传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转向以及开始实行的民族迫害，对苏联这个多族群国家的生命力起到了主要和长期的破坏作用。正如 Mark Beissinger 令人信服的指出，在民族主义时期，“帝国”被认为是过时的人为构建，最终将分裂为构成其组成部分的各个民族国家。因此，一个被其市民和邻国定义为“帝国”的国家通常好景不长。印度如今没有被视为“帝国”，但如果我们开始听到人们普遍这样谈论印度，我们就能推想它的分裂也会大体如此。优秀的苏格兰民族主义学者 Tom Nairn 熟谙这种关联，他花费了二十多年试图使他的同胞和全世界相信：大英帝国是人为构建的，因此难逃劫数。列宁和斯大林同样非常清楚这一点，正如 Terry Martin 的论述，肯定性行动的帝国是一种自觉地、不惜任何代价以避免主观上被视为“帝国”的策略（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empire）。1930 年代，斯大林认为付出过于高昂，但他的改革同样代价高昂。现代社会中，帝国通常与两种事物相关：民族压迫和被迫同化。事实上，斯大林的民族压迫只涉及一小部分非俄罗斯族，但却给所有的非俄罗斯族造成了帝国主义行径的印象。斯大林的俄罗斯化方式相对温和，国家支持的民族构建努力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但他首肯的好大喜功的并且常带有侮辱性的俄罗斯中心主义宣传，错误地给大众造成了政权俄罗斯化的印象，国家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失去了不少此前通过本土化和肯定性行动政策收获的民心。

如果要指出 1953 年 3 月苏联统治多族群国家的战略，认为苏联一方面追求民族构建政策，同时另一方面在向人民灌输主观的帝国观念（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empire）并不太为过。赫鲁晓夫的确结束了斯大林的民族迫害政策，尽管他只是对政策的部分后果采取了措施，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德意志人和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仍不能返回祖居地，而较为温和的抵制闪米特族的非暴力运动得以制度化。赫鲁晓夫结束了公开的沙文主义式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话语，但俄罗斯族仍是“老大哥”，其影响力日益提升。勃日列涅夫领导期间基本延续了这条路线，同时越来越理性地对待民族政策。但这些改变来得太迟了，或者说政府已失去了改变的能力。如果说 1920 年代，本土化运动是中央政府强加到不怎么情愿的俄罗斯化的共产主义者之上的，那么 1960 年代到 1970 年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大众教育的发展和民族国家构建过程，本土化运动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趋势，并且彻底造成了共产主义民族精英要求共和国自治权的局面。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1980 年代，俄罗斯族和其他命名民族（titular nationals）都相信，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之

外的大多数加盟共和国中，其他命名民族（titular nationals）有更多就业和教育机会。而俄罗斯人与其通婚的后代通常登记为非俄罗斯族。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衰退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中央权威的制度性破坏，大量涌现的揭露斯大林对非俄罗斯民族罪行的出版物，使得帝国观念逐渐为人民所接受。甚至很多俄罗斯人认为本民族也受过压迫，并支持叶利钦领导的非帝国的俄罗斯取缔“苏联帝国”的运动。

苏联历史中有很多颇具讽刺的地方。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声称已超越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历史阶段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精英，最终在自己的政体内被**制度化的民族**所终结。其次，尽管对民族国家构建的支持是避免现代社会中帝国主义分崩离析厄运的一种策略，苏联最终却成为其主观的帝国观念（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empire）的受害者。苏联民族政策的双重效果——构建民族和破坏民族的双面性——在政权解体前一年的春天尤为显著，6个加盟共和国——亚美尼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摩尔多瓦——立意要脱离苏联，而另外9个——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全民公决结果是压倒性的同意留在改革后的联盟中。1991年8月政变失败后，苏共中央“自杀”式解体，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最后纽带消失了。最后，也是幸运的一点在于，列宁和斯大林沿着民族边界划分疆域的政策，使得苏联的解体过程进行得顺利而平和。而在违反了这一原则的地方，如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摩尔多瓦右岸，则上演了流血冲突。在一些优势民族的民族主义者转而压迫少数民族的小型帝国主义的政权内——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人民诉诸于武力。尽管去殖民化的很多方面已经在苏联境内发生，但这些政权未来仍面临建构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这一艰巨任务。

一些术语译法：

social categories 社会范畴
Russocentric 俄罗斯中心主义
Sovietology 苏联学

nationness 民族属性
Russificatory 俄罗斯化
national territory 民族领土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李健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